

一辆战国马车“复活”分几步?

文/新华社记者 何问 范培珅 张睿



这是2011年拍摄的出土于马家塬西戎墓葬的一辆战国马车车轴。
(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)



这是2008年拍摄的出土于马家塬西戎墓葬的一辆战国马车轮面装饰。
(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)



这是马家塬西戎墓葬出土的一辆战国马车的复原效果图。
(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)

车厢呈方形,两边辅以两个巨轮,中间以一轴相连,车轮、车厢栏板上等均分布着形状各异的金、铜、银镂空饰件,有几何图形,也有动物图案。

这辆正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出的战国马车出土于马家塬遗址,仿佛让人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廊道,窥见西戎贵族的奢侈生活。

马家塬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,是战国时期一支西戎部落的首领及贵族墓地。对此墓地的挖掘起始于2006年,截至目前已连续发掘清理墓葬78座,出土车辆69辆。

“这是我们在马家塬西戎墓葬中尝试完整提取的第一辆马车。马车形制保存完整,装饰精美豪华。”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刘兵兵介绍,通过整体清理表面填土、揭露木质本体,然后提取车辆表面饰物,并对车体饰件进行除锈、病害处理、封护、原位回贴等,才展现出现在的模样。

刘兵兵介绍,马家塬遗址出土的车辆以双轮独辀马车为主,由衡、轭、辀、轮、舆等数个构件组成,主体部分皆为木质。高等级车辆由金、银、铜、锡和各类型质的珠子进行装饰,部分车辆表面还有髹漆彩

绘。目前出土的这些车辆均是为陪葬特制的礼仪性用车。

“从车辆类型到装饰、题材、纹样,马家塬出土的车没有一辆重复的,这才是真正的‘壕’!”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谢焱说。

为了给观众呈现更多实物,考古人员还复原了2辆独具特色的战国车乘。其中14号墓出土的1号车以金、银等昂贵材质及汉蓝、汉紫和玛瑙珠等各种珠子为主,是“豪华”的代表;16号墓出土的2号车以髹漆彩绘上贴铜饰件为特色。

用谢焱的话说,考古

发掘与文物保护复原工作就像侦探破案一样,需要考古工作者抽丝剥茧、按图索骥,根据发掘到的线索,辅以合理的推测,达到还原历史原貌的目的。

“由于车辆木质构件已经腐朽,不少出土马车发生坍塌变形等情况,因此车乘复原最大的难点在于对车辆构件的形制、尺寸、组合关系等数据的发现与采集。”谢焱说,结合文献考证、民俗学调查、生产生活习惯实地调研等,考古人员还利用“对称”等方法进行推测还原,比如根据保存相对完整的车轮还原另一边变形车轮的大小,或根据装饰件推测装饰位置构

件的尺寸等,然后在模拟复原中进行不断修改。

“这些‘壕车’可以说是古代制造工艺集大成者。在对出土车辆的解剖发掘中,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木工、金银铜铁匠、布料、皮革手工制造者等各个方面工艺水平。”刘兵兵说,因此利用原工艺、原材料复原车辆更是需要群英荟萃。

谢焱介绍,已经完成复制的2辆车汇集了考古发掘、金属装饰物的复制、木料漆器手工、材料检测研究等多个领域专家的智慧和努力,历时近4年。以14号墓的1号车为例,车上的近4万颗料珠都是根

据原成分手工制作的,原车使用的木材有榆木、榄仁、柞木等。

现场发掘、数据采集整合、模拟复原、车件和装饰件复制、装配……一辆战国马车“复活”呈现的不仅是古代社会的生动场景,更是考古专家们数个不眠不休的日夜。

“我们希望大家对历史的理解不只来自史料。”谢焱说。通过考古发掘、文物保护与复原等工作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历史和实物信息,让考古发掘文物活起来,是文物工作的使命所在。就像现在,西戎文化已不仅仅只停留在文献的只言片语中。

为纸张诊病的“古籍医生”

文/《光明日报》记者 王美莹

修复古籍,是门磨工夫的手艺。方寸之间摆满镊子、棕毛刷、糨糊、裁纸刀等工具,在工作台前一埋头,不知不觉,几个小时就过去了。

40多年来,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杜伟生这样度过了无数个日夜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,他曾主持过敦煌遗书、《永乐大典》、西夏文献等珍贵古籍的修复工作。

2012年退休之后,他被返聘回国家图书馆,除了继续做修复工作,还会指点年轻修复师。每个工作日上午,69岁的杜伟生都会赶到国图南区的修复室,这已成为一种习惯。

“人会得病,书也是”

杜伟生清瘦而健朗,

神态冷静坚毅。由于长期伏案工作,他落下了颈椎病。

“人会得病,书也是。”杜伟生说,“古人常常把书当作人来看待,书头、书眼、书口、书背、书脊、书脚等,全根据人的身体部位来命名。”随着时间流逝,纸张会老化、酸化、劣化……研究显示,如果纸上的黄斑占比超过60%,保存期限就仅剩50年了。修复师要抢救的就是这类濒危古籍。

在图书馆学、档案学研究中,人们大概发现了200多种食书虫(也称“书蠹”)。它们和青霉、红霉、黄曲霉等微生物都是书的“敌人”。此外,还有一些常见的人为破坏,例如撕皮、缺页,或遭遇水与火的“洗劫”。

“越修胆越小,越做越谨慎”

敦煌遗书最初修复时,采用的是行业惯用做法:将纸张搓薄,在后面贴纸,对古籍有一定的破坏。杜伟生说:“那时处于新老修复理念交替时期。接触了越来越多的珍藏古籍,

了解了其他可能的修复方法后,我觉得自己越修越胆小,越做越谨慎。”

1987年,杜伟生成了古籍修缮组组长,敦煌遗书修复工作因他的坚持而暂停。1991年再次启动敦煌遗书修复时,他从前辈修复《赵成金藏》以及自己在英国修复敦煌遗书的经历中汲取经验,确定了抢救为主、治病为辅,采取最小干预的原则进行修复,最大限度地保护原作的内容、原料与装帧形式。

杜伟生带领组员以每月180米的速度修复敦煌遗书,一干就是10年。修复中,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种加蜡的硬黄纸,压干后特别容易裂开。经过反复琢磨,他摸索出“分段压平”的方法,成功攻克难题。

另一个绝活,是在修

复《永乐大典》时被“逼”出来的。2002年,修复组决定采用不拆页的方式修复《永乐大典》。杜伟生只能把工具伸进古籍中间“掏”着补,并根据感受不断调整。今天,这种“掏补”技法已成为古籍修复的专业技法之一。

“这条路很窄,但是很长”

2007年,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。从事古籍修复的人逐渐多了起来。

古籍修复涉及文物学、化学、造纸学、艺术学等学科知识,具有交叉学科属性。国图新入职的修复师中,有许多学习化学、造纸等专业的高学历人才。一次,有位年轻同事利用显微镜观察纸的纤维结

构,很快得出了纸张材质鉴定结果。这让一向根据经验“摸材质”的杜伟生深受触动,也倍觉喜悦。他觉得:比起修书,人才培养和技艺传承同样重要——“这个行业虽然不大,但只要有书,就得有人”。

现在,杜伟生有三四十个徒弟。他认为,培养修复人才必须把学校教育和学徒制结合起来:“专业院校的优点是博采众长,学徒制则能把师傅的技艺和工作习惯传给学生。”

“这条路很窄,但是很长。”杜伟生这样评价古籍修复行业。2001年,他执笔制定了《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》。这位毕生情牵古书的“古籍医生”,把赓续传统文脉看成人生大事:“这不仅是修复师的责任,更是时代的责任。”